

「中國棉業史」介評

黃富三

書名：中國棉業史

作者：趙岡、陳鍾毅

出版者：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一九七七年

紡織業與製陶業同爲人類最古老的工業，也是關係民生最密切的工業，它的發展程度往往可以做爲文明進步的指標。更重要的，以棉業爲中心的紡織業在十八世紀工業革命時扮演了先鋒與主導的角色，奠定了近代工商業社會的基礎。且有不少國家步英國後塵，亦藉紡織業達成經濟起飛，如日本、香港、臺灣、韓國等。因此，紡織業發展史的研究不論在古代或近代經濟史都有它獨特的重要性。

中文經濟史著作不多，能適切結合經濟理論與歷史事實以處理問題者尤少。原因是一般史學家對經濟學知識稍嫌忽視，而經濟學者亦少注意歷史問題。由於本書作者趙岡、陳鍾毅兩位教授爲經濟學者，對歷史亦有良好的造詣與濃厚的興趣，由其執筆寫經濟史正可以彌補

科際間之缺憾。

本書目的在勾劃中國棉紡織業的發展過程，但其貢獻不僅在於史的敘述與考證，更在於其對各個重要問題之精闢解析，此正是坊間常見之經濟史著作所缺者。

誠如作者自序所言：「棉紡織生產在中國有悠久的歷史。不過，在這方面的發展並不是一個簡單的過程，而是充滿了費解的現象。」這些費解的現象正是作者欲加以解析、處理的，「例如，棉花傳入中國以後，竟有很長一段時期未被人重視，做為主要纖維原料。直到宋末元初，棉紡織才在中土推廣。在棉紡織生產盛行以後，竟有若干先進的紡織工具遭受淘汰。中國歷史上沒有從事棉紡織的手工業工廠。直到西法紡織傳入後，新式紗廠出現，手工業棉織廠才以附庸的姿態在城市中發生。更費解的是，各種實地資料顯示，現代紡織品在中國出現以後，鄉村的土布業不但未受淘汰，反而一度空前興盛。即使是中國境內新式棉紡織工業的發生與發展，也是十分曲折複雜的。」

本書計分十章，自「棉花傳入中國的歷史」敘至「臺灣紡織工業之發展」，由各角度探討棉業之滄桑及其因果關係，作者之敏銳透視力處處可見，發人深省之論不少。

第二章「植棉之推廣」中，論棉花傳入中國邊疆一千多年後，方於宋代抵達本土之因，作者提出之解釋很多是一般人所忽略的，如品種的改變、軋花工具的改進、元明政府之政策等。

第三章「棉布的傳統生產機構與運銷組織」中，指出在西法傳入前，棉紡織乃家庭副業。其特徵是，一、幾乎家家戶戶均有；二、力求自足。農戶是生產者，利用農閒與老幼婦女生產，只有極少的城鎮有專業的紡織者。而且，無手工業工廠。其理乃是家庭副業對工廠生產具有排拒性，因工廠之產生須工人邊際生產力高於最低工資，資本主有利可圖，方肯投資

設廠。然而，家庭副業不受此法則之限制，對於有剩餘勞力之農戶，賺一元是一元，有比無好，因此，即使收入極低仍能存在。在此情況下，工廠無力競爭，無由生存。這些話勾劃出中國農村經濟的特質與癥結。中國之龐大人口固然代表中國人生存韌力之強，但自另一面看，不正是中國之貧窮與無力工業化之大障礙嗎？

第四章「生產組織對紡織技術的影響」中，作者指出在工業革命前夕，中國紡織工具技術超過英國，在一三—一三（元代）王楙所撰「農書」已提到多錠大紡車，比英國紡紗貞妮早四五年，而且紡車，除用人力、畜力外，亦有用水力者。但何以未有工業革命？作者研究其理，指出大紡車生產效能極高，但是須多人（三人）同時操縱，此不適合中國小農制，因農戶很難同時排出三個人一起工作。故讓英人在近代工業發展拔頭籌，實令人嘆惋。

第六章「新式棉紡織工業之興起與發展」中論及李鴻章於一八九〇年設上海機器織布局之不當措施。李氏於一八八〇年為此局取得二特權：一是其產品在上海繳正稅後，在各地運銷不再納釐金；一是專制十年，「只准華商附股搭辦，不准另行設局。」最後，甚至停止華商附設。作者認這是妨礙棉織發展之關鍵因素。因上海機織局延至一八九〇年方開工，民間喪失十年的寶貴投資時光，而讓日本得以從容發展紡織業，奠定其富強之基。作者在此章批駁李氏甚力，極有見地。惟認為「李鴻章蓄意限制棉紡織業的發展」一點，恐有過當之處。李氏乃清末致力近代化運動之主將，絕不至「蓄意」阻止此一重要工業之發展。合理的解釋也許是措置失當或官僚政治之弊。李氏的構想顯然是企圖建一大規模之近代工業，足以與外商對抗，上海機織局之「只准華商附股搭辦，不准另行設局」一節，正有既擴大工廠規模又不妨礙民間投資機會之用意。不幸，李氏未了解中國官僚政治之積弊，更未認識官營企業之難辦，以致機織局十年未開工，却又不准民間設廠，平白喪失寶貴時光。類似的事件一再地

在近代史上重演，而中國也益加積弱。

第七章「新式棉紡織廠的比較分析」中，作者指出華商之不如日商非因中國人接受新技術之緩慢，而係資本不足等原因；而資金之不足，非國家窮，而係財務計劃與企業管理不善所致。此表現在商人之好投機，以小錢作大生意、自殺式借貸及不注意折舊等現象，故略遭經濟不景，倒風即起。此確為中國人經商法的大病根，多數人抱着「能撈就撈，不能撈就逃」的心理，很少人會為企業定下十年、百年大計。何以中國人會有這種心理？作者如能進一步討論將更有意義。筆者可提出一點供參考，即中國商人（甚至中國人）普遍地缺乏安全感，他們對政府、對社會、對一般人都無信心，對朝令夕改的政策尤其恐懼，故能賺就先賺，投機取巧，不作細水長流之計。

第八章「手工紡織的變遷」，論手工業在洋貨競爭下居然仍能生存。作者一語道破其關鍵，即手工業乃農村副業，其存亡不受制於工廠經營法則。此堪稱中國傳統經濟之一大特色。

第十章「臺灣紡織工業之發展」，象徵中國工業化終於開花、結果。由政府與企業界的努力，配合國際環境，棉業與其他紡織業突飛猛進，奠立工業化之基。

縱觀全書，作者顯然認為中國棉業發展史之所以如此主要歸因於小農副業生產方式。副業生產阻止技術之革新與生產規模之擴大；但也抵制了洋貨之傾銷，表現其生存韌力。此可謂一語解答了幾個疑難的歷史問題。

本書敘述清晰、流暢，可讀性高；且論理嚴謹，極富見識，堪稱難得一見之經濟史佳作。